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说得史透彻一点，一切历史都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所以，读历史就是读现在。

这期丰收，《碰上了“好政策”》里，作者利用相关资料，通过艺术加工对西晋和东晋的“好政策”作了传神的评述。

文中，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现。在当今这样一个需要思考渴求思考的年代，的确给人以启迪。

“‘好政策’来得容易，来得快，其保险系数也就不保险了。”

“这种突如其来‘好政策’好不好？……只能说是在刺激了少数人的兴奋点的同时，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的局面。”

“真正的‘好政策’，应当是‘普及型’的，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践检验的，有利于推动时代发展的。”评价一篇文章，本不该过多引用文中的内容，但我想要表达的，它说得更好更透彻更鲜明。

若有人觉得，读史而已，不想做这样那样的思考和解析，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活动，反正今天有太多的娱乐，多到似乎什么都可以成为娱乐。

这么说，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不乐意了，尤其是那些信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

其实，我也一度认为，你写的不够好，是因为你读得不够多。

然而，别忘了，读万卷书后还有一句——行万里路。大自然，才是我们要反复读的一本书。

每天，我们都可以免费地阅

读大地和天空，看云一动不动或者变幻万千，看它在大地的身影忽明忽暗。写诗的顾城曾说过，他经常被大自然的美感慑得不能行动，“我被注满了，我无法诉说，我身体里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战栗，只能扑倒在荒地上企图痛哭。”

你看，天籁之声，万象之美，如果我们放弃和忽略了大自然这本书，就等于把自己赶进创作的死胡同了。

写作的根，是生活，永远只是活生生的生活。

是《身体最初的记忆》里，“我蜷缩着，像一个静静等待发芽的果仁。”

是《还乡与命运》里，“草民回来无非是找找当年的快乐，修修自家的老屋……衣锦还乡就像游街巡游，在父老乡亲的羡慕或者嫉妒中找找人上人的感觉。”

是《剥掉文化的外衣》里，“那些长在山脚田边的某株古茶树，茶农们采了炒了自己喝的，遇上好年份，茶茶的成色甚至会超过什么五大名椒、正山小种。”

是平时和家人吃饭，与朋友聊天，谈一场恋爱，骂骂老天，是想哭的时候哭，想笑的时候笑，这些才是我们的“根”。

所以，读书，历史的还是现代的？都没关系，只要你写得好。至于体裁，散文随笔小小说？都没关系，只要你写得好。究竟哪种技巧，哪种方言？都没关系，只要你写得好。

毕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写文章和做学问，是两回事。

## 编辑手记

## 同心传译

# 冷血复仇记

□（德）米夏埃尔·罗特 著 王 艺 译

我最好的朋友夏洛特几乎不与我联络了。

从前，我们共度每个周末，有时与大伙一起玩乐。如果一整天没见面，我们便会大煲电话粥。

某一天，她告诉我，她在咖啡馆结识了某人，然后爱上了他，然后，然后，然后……

她向我保证，不会让我们的友谊受影响，我们依然可以经常见面。然而，几周之后她告诉我，她想搬到那位小伙子住的住处。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她甚至还没向我介绍过那家伙，现在又要和他同居一室。

我最好的朋友夏洛特，抱定单身主义理想，身边有儿童超过五分钟便浑身难受的夏洛特，从此要踏上贤妻良母的道路了吗？

我隐藏了自己的失落，免得被她发觉，然后去帮她搬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再没有与她合煲过电话粥。抑制不住牵挂时，我便给她发短信。她多半会在第二天回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明白，我们的友谊对她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的位置被某人取代。

我继续着形单影只的生活，为取得一份助理救护师的工作而努力着。一天晚上，在某本教科书的催眠作用下，我睡在了沙发上。不知何时，持续不断的敲门声将我吵醒。

“听见了听见了！这就来，别敲了！”我不免有些烦躁，打开房门，看到的情景却令我怔在原地。

第一眼我甚至没认出她来。直到她望着我，开始啜泣，我才发觉，夏洛特正站在我的门前。

她穿着一件我见过无数次的连衣裙。然而这次，上面多出了裂口和血痕，夏洛特一只眼望着我，另一只眼，已经高高地肿了起来。她一定是被囚禁了，看起来就像与两个拳击手干了一架一样。

右侧眉骨开了花，嘴唇也有裂伤，惨不忍睹。我把她让进屋里。关好房门的那一刹那，她便伏在我肩上哭起来。我扶她进卧室，找到了纱布，为她擦拭脸上的血，清理伤口。

夏洛特不说话。我只能看到她那大大的，仿佛在乞求原諒的眼睛，以及忍受着我碰触伤口带来的疼痛的面庞。我把膏药贴在她眉骨上，给肿起的眼眶敷了纱布。

“换下这身衣服。”我劝她道。我扶她起身，当那件连衣裙从她的肩膀滑落到地上，我在她后背和腹部发现了更多的瘀伤。“他干的？”我还是问了出来。她点头，眼睛盯着地板。“这样多久了？”我追问。“很久。”她低声道，又哭了起来。

我将她拥在怀中，吻着她的额头。“你去我床上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给她盖好被子后，我回到客厅，琢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她身上的瘀伤表明，这种虐待起码有段时日了。

我坐下来，权衡着。也许我该

## 流年碎笔

# 身体最初的记忆

□ 晨 风

我总觉得身体的记忆是在母亲子宫里就开始了。

我蜷缩着，像一个静静等待发芽的果仁。四周没有光，或者，我没有张开眼睛。然而我听得到声音，我闻得到气味，我感觉到温度，感觉到另外一个身体跟我连接在一起的心跳，呼吸。

我像是浮在水流里，可以听到水波微微荡漾的声音，感觉到水波流动。水流是温热的，贴近我的皮肤，我像是被安全的港湾保护的一艘船。

我试图感觉那一个环绕在我四周的空间，柔软而温暖的空间。我试图伸动一下我蜷曲的手脚，挪动一下拱着的背，向下探一探头。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有一个出口，也许我想出去。想从这个安全、温暖、幽暗、潮湿的空间出去。想出去，却又恐惧出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还要多久，才能出去？我静静等待，像果仁等待撑开果核的硬壳，探出新绿的芽。

我动了一动，不多久，感觉空间外面也有反应。是一只手在抚摸我，轻轻拍打，摩挲，像一种讯号，好像很遥远，却又很熟悉的讯号。

我再动一动，那拍打、抚摸的讯号就更明显了。我们像玩着身体口令的游戏，我们都渴望感觉到对方。

那是我学习到的最早的语言吗？一种心跳的节奏，一种血液的流动，一种身体的温度，一种呼吸的起伏，我静聆听着，我静感受着，被另一个人的体温包围呵护着的幸福。

那个在母亲子宫里的空间，是我第一个单纯而清晰的记忆。那个最初的空间，或许是我一直想回去，却再也回不去的空间。

我们通常讲的“记忆”，是从三四岁开始，但是，那或许只是大脑的记忆，视觉的记忆，可以用文字复制出来的记忆。文字复制出来的记忆通常并不完整，也不绝对真实。

我跟朋友作过一个实验，大家围坐在一起，轮流叙述自己的梦。一开始，梦境的叙述并不完整，很零碎，很片段，常常衔接不起来，甚至彼此矛盾。叙述的人说着说着便说不下去，觉得糊涂了，笑着说：“讲不清楚了！”

可是，如果让同一个叙述者再说一次，他的叙述就会有条理得多。如果让他再说第三次、第四次，他的叙述就越来越有条理，梦的轮廓、情节、画面也越来越清楚。

这样的实验作多了，通常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最后整理出来清晰有条理的叙述。印象深刻的，常常反而是那第一次说不清楚的、模糊的、零碎的、拼接不起来的片段。

## 读史札记

## 流年碎笔

# 身体最初的记忆



梦和真实人生很像，其实并没有逻辑，逻辑是我们后天学习来的秩序，甚至是为了使人生更像教条而硬生编造出来的秩序，其实有很多作假的部分。但是，把梦说得很有条理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作假。

我很喜欢欧洲超现实主义大导演布纽尔，他的电影《自由的幻影》、《中产阶级拘谨的魅力》都荒诞不经，一堆拼凑起来的、没有秩序的人生片段，那么荒谬，却又那么真实，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害怕没有秩序的人生，其实是我们害怕真实的人生。我们害怕在别人面前把自己的梦讲得乱七八糟，总要假造出一个秩序。

讲得清清楚楚的、有条理的梦，加入了很多作假的成分。看起来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误差的人生，会不会也一样避开了真实的人生课题？

《红楼梦》的伟大，正是因为作者“满纸荒唐言”。他不害怕荒唐，把梦说得离奇荒诞，所以才这么真实。

我还是想回到母亲身体里那个最初的空间，感觉温度、水流、呼吸，心跳，感觉那么真实却没有意义可言的讯号。那些节奏、速度、韵律的起伏，那些笃定的抚摸与轻轻的拍打，像秘密的叩门声，都是我身体里最初的记忆。

然而，我出生了，探出头来，嚎啕大哭，从此离开了那最初的记忆空间。

新的空间很明亮，刺激我的瞳孔，声音很嘈杂，找不到原来幽静的韵律，很多重大的拍打、挤压、碰撞，都跟最初身体的记忆不一样。

我不断在适应新的空间，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最初的空间，时时刻刻想到那幽静、单纯、全然只有自己的空间。

我喜欢一间不大的卧室，像一个窝。睡眠的时候没有光的刺激，没有声音的干扰。我蜷曲着身体，被窝连头带脚一起包裹着，像一个蛹眠的茧，回到最初子宫

# 剥掉文化的外衣

□ 李海燕

乐的是消费了的人，还真以为自己是在为文化付费呢。

孰不知，以金钱衡量文化的价值，仿佛是给空气称重，对空气的价值毫无意义。就像茶叶，不要以为武夷最好的茶是大红袍，金骏眉，武夷最好的茶是茶农称之为“菜茶”的。那些长在山脚田边的某株古茶树，茶农们采了炒了自己喝的，遇上好年份，菜茶的成色甚至会超过什么五大名椒、正山小种。菜茶大概是武夷茶文化最集中、最自然的体现者了，但在消费主义者眼里，它们却是最没价值的。所以，有的时候，文化的外衣，远比文化的内涵更容易辨识，更容易换个好价钱。

说到这里，这个问题几乎要从哲学高度来探讨了。

宋代有桩禅宗公案，讲修习的过程，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看山还是山。简化点说，这是对事物认知——超越——回归的过程。人生也罢，时代也好，

# 剥掉文化的外衣

□ 李海燕

又或者是对事物的认知，时常要经过这样先做加法再做减法的过程。什么都要披件文化的外衣，这是做加法的过程，利弊都有，就看怎么取舍而使利大于弊。但这样的过程很难超越。然而，这并非最终和最好的结果。

最好的在于回归。当回归的时刻来临，人生的境界始大，仿佛月涌大江舒，静水深流之下，所有曾经的惊涛骇浪都复归为水。到了无需说、不必说的时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所以，文化也是这样，在加法的过程，它有时难免要沦为人家的外衣。然而，回归的时刻终将来临，剥掉文化的外衣，并非文化的失落，那时，它是所有事物不可分离的内涵。就像有一天，我们将这样喝茶：不要姿态，无需仪式，甚至心里也没有任何文化的挂碍，只有一杯简朴的热茶，和真实的自我，共度一段清幽四溢的柔软时光，庶几，有几分禅茶的滋味。

# 非常文青

# 还乡与命运

□ 王凤丽

还乡与命运，这两个看似不交叉的概念放在一起，人们大都关心命运，对还乡却并不感冒。因为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全都在其掌控之中。

同一个村子里出生的张三和李四，老子和娘都是侍弄犁耙牲口的农民，吃的都是夏天的萝卜冬天的白菜，穿的都是屁股上缝着补丁的裤子，一块光着身子扑腾到河里洗澡，挽着膀子到几里外上学。有时，路上还会突发奇想地去偷几个地瓜烤着吃。于是，一个负责放哨，一个负责动手，一个忙活着捡柴火，一个折腾着在僻静处垒炉子。

他们同年同月，甚至同日出生，他们生而平等，却在某个岔路口分手，从此各自上路不再有交叉。这就是命运。等到他们再次相逢，或许是几十年后，飞黄腾达的张三和默默无闻的李四，同样一抔黄土落脚在村后的山脚下。这算是命运轮回的终点站吧。

在抵达终点之前，或许还有许许多多次还乡。对感情丰富的中国人而言，故地重游的滋味往往兴奋而复杂。

还乡，就是故地重游的一种。

当然，一个无名小卒之于他的故乡，或者一个官宦名士之于他的故乡，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无非是故乡土地上出生长大的泱泱子民的一员，今后无论流落他乡还是叶落归根，都只不过是少一抔黄土或者多一个土丘而已，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涟漪。后者对于故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县志乡志要书写，村里的族谱要记录，连父母官都要接见，于是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全跟着沾了光。

正因如此，草民回乡还是衣锦还乡，感觉也就不一样了。草民回来无非是找找当年的快乐，修修自家的老屋，无意间还要对不如意变化表现出惋惜和鄙夷，于是更加怀念起当年的样子。衣锦还乡就像游街巡游，在父老乡亲的羡慕或者嫉妒中找找人上人的感觉。于是心情就好了很多，不禁对家乡巨变啧啧称赞。

故地还是故地，人已不是当年的那个人，所以人和地之间就有了不一样的排列组合。

正因为这些排列组合的神秘，人们对命运力量的信奉乐此不疲，所以就有了许许多多以此讨饭吃的人。大彻大悟，洞悉世事轮回的高手，我这样朴拙愚钝的人至今未尝见过，倒是口中念念有词，很有点神秘色彩的民间高手，我还是见过几回，而且很有点相信。出于对未来世界的好奇，或是出于追求富贵荣华的小算盘，我都很想从那里找到答案。无奈高手就是高手，冥顽就是冥顽，高手的大智慧，终究不能被凡夫俗子的榆木脑袋所理解。

其实算与不算，信与不信都不重要，细究起来，命运也是一种还乡罢了。

容易、来得快，其保险系数也就不保险了。以司马伦为例，此人显然不是做皇帝的料，没过几个月，就在政治斗争中乖乖下台了，皇帝宝座重又回到晋惠帝屁股下。很快，司马伦父子几人全被处死，文武百官中被司马伦任用过的全部罢免，结果，朝廷各部门留下的官员所剩无几。

当权者随心所欲鼓捣出的“好政策”，常常莫名其妙地成全一批人，这简直是历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就是因为当时的行政没有合理的章法，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朝令夕改乃是家常便饭。体制之弊，使中国封建史总是在不停地绕圈

子，以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后人读史，常常能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至今日，这种随心所欲出台“好政策”的情况恐怕也还没绝迹。

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政策”好不好？对于受益者来说，当然好极了，无异于发了一笔横财嘛。然而，放在全局的范围来看，这种“政策”，只能说是在刺激了少数人兴奋点的同时，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人心涣散、秩序混乱的局面。真正的“好政策”，应当是“普及型”的，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实践检验的，有利于推动时代发展的。

□ 李伟明

# 碰上了“好政策”

晋朝是个盛产荒唐事的朝代，司马伦这样随心所欲出台的“好政策”，对那些受害者来说可真是喜从天降。如此随意地提拔干部，不仅是司马伦特有的行为。据《资治通鉴》第九十卷载，西晋灭亡后，东晋的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位，文武官员都晋升二级爵位；晋元帝还打算对所有曾经投帖建议自己接受皇位的人再给一些优惠政策：干部身份的加爵一等，平民身份的则提拔为干部，这样一来，总共共有二十多万人获益。

看来，在人治社会，碰上诸如此类“好政策”并不是稀罕之事，只要看最高统治者高兴不高兴就是了。不过，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好政策”来得